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陈昌兵*

摘要: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为此政府扩大了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福利赶超”使得政府支出超出了政府收入,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减弱,经济增长落入了“增长陷阱”。这一理论逻辑得到本文构建的数理模型的证实。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已出现“福利赶超”的迹象,为了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我们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福利赶超 收入差距 政府支持系数 增长陷阱 可持续增长

一、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起步,对随后的发展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1970 - 2003年间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发现那些起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 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之后,有些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有些虽然摆脱了低收入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那些起步人均GDP在1 000 ~ 3 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三十余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见图1)。

多数拉美国家在1950年人均GDP还不足1 000美元,到1980年人均GDP都突破了1 000美元(除萨尔瓦多),有的高达3 000美元。拉美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黄金时代”的增长,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增长陷入了停滞(见图1)。1978 - 2008年间,中国人均GDP从几百美元上升到2 000多美元。与拉美国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吗?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增长?拉美国家哪些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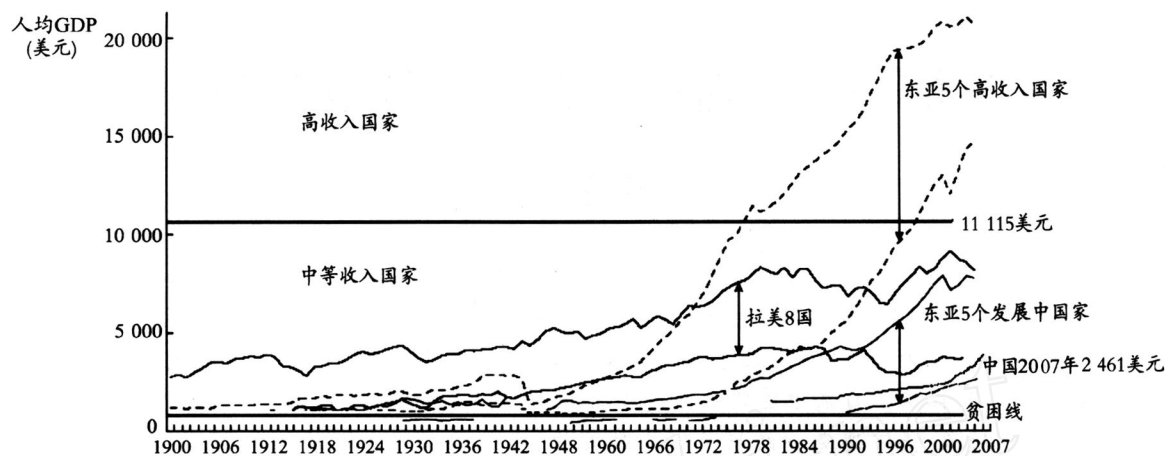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经历“马尔萨斯均衡”、“工业革命”(或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即新古典增长)、“新经济分叉”(内生经济增长)等阶段;在经济赶超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会出现低收入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 266.8美元,进入了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中下收入国家人均GDP为906 ~ 3 595美元)。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在递增,增长机会很多。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赶超的后期,处于发展与转型时期,有可能走向新古典理论所述的均衡增长路径,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增长陷阱”。中国只有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能避免“中等收入增长陷阱”,否则会陷入中等收入的停滞阶段(见图1)。

本文研究的框架结构为:对拉美国家如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逻辑,这作为第二部分:文献述评。将本文所提出的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

* 陈昌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ccb_ccbp@163.com。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批准文号06&ZD004_0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本人博士后合作导师张平研究员、刘霞辉研究员和仲继垠研究员和课题组的张晓晶、汪红驹、赵志君、常欣、张磊、王宏森、黄志钢、吴延兵、袁富华、张自然、汤铎铎、马岩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和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阱 的理论逻辑进行数理模型化 ,这作为第三部分 :数理模型。在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基础上 ,利用数值模拟分析“福利赶超 对“增长陷阱 所产生的影响 ,这作为第四部分 :“福利赶超 与“增长陷阱 ”。最后 ,我们得出结论 ,并提出政策建议 ,这作为第五部分 :结论及建议。



资料来源:根据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2004),中文版,54页图 1、2基础上绘制。

图 1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

二、文献述评

经济学中所谓的收入陷阱 ,是指一种均衡状态 ,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 ,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 ,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 ,这样就会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 (生存)水平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在于 ,贫困国家如何通过资本积累摆脱“贫困陷阱 ”,所以 ,大多数文献都把一个临界水平的积累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前提 ,因此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资本的积累达到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 ,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 ,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 ,如拉美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的高增长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增长陷入了停滞 (蔡昉 ,2008)。

中外学者就拉美国家如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Acemoglu 等 (2001)认为拉美国家早期殖民者留下的制度不利于以后的增长。Alesina 等 (2004)认为 ,拉美国家的语言、民族的多样化 (diversity)妨碍了这些国家增长。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包括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之间的更替及民粹主义政策与正统宏观政策之间的更替 ,这些不稳定导致了扭曲的宏观政策 ,影响了投资率与投资者的信心 ,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Rodríguez, 2001)。还有学者认为拉美国家实行了错误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赶超 发达国家 ,从而陷入了低效率的恶性循环 (林毅夫等 ,1994)。

有学者认为滞后的工业化与过度城市化造成了拉美国家“增长陷阱 ”。苏振兴 (2006)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启动 ,促成了拉美国家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 ,推动了社会的初步转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受到国内市场规模和外贸失衡两大因素的制约 ,拉美国家在 1973 年之后纷纷走上“负债增长 ”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终结 ,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外向工业化 ”模式。虽然拉美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 ,但由于发展模式在“内向 ”和“外向 ”之间的来回摆动使得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滞后从而落入“增长陷阱 ”。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超过经济发展的要求 ,而经济发展也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的现象。西欧百万人口的城市年均人口增长率只有 10‰~ 20‰ ,而拉美国家同类城市人口增长则为每 10 年翻 1 番 ,但这并不意味着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之快已对城市化提出了这样高的要求。到 70 年代中期 ,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已占地区总人口的 60% ,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超过 20%~ 30%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OLS 数据库)。1968 年曾有学者指出 ,按正

就本文而言 ,收入陷阱与增长陷阱是同义的。

常的发展速度,当时拉美的城市人口应为 1 520 万,但实际上已达到 3 000 万,超过正常水平的 1 倍。过度城市化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诸多问题,未能使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带来产出量的增加反而使增长长期停滞。

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环境状况、改革与调整的进程、社会稳定程度及国际市场影响等。但其中许多因素的作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平,最不发达国家常常收入分配异常不公平。目前位居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基尼系数分别为 0.25 和 0.32,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58,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塞拉利昂,基尼系数高达 0.63 (蔡昉,2008)。

中等收入的拉美国家在向高收入跃升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处于不断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充裕的劳动供给和稀缺的资本决定了一国的“强势资本、弱势劳工”的基本格局,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原因在于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可能在短期内转移出来,在收入较高的工业和服务行业就业。在转移过程中,不仅那些尚未转移出来的农民收入较低,难以提高,就是那些已经转移出去获得新的非农就业的“农民工”,由于劳动市场供给过大、竞争激烈,工资已被压在很低的水平,工人的各种权利也很难得到保障,因为在失业风险很大的情况下,“农民工”会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及“农民工”所获取的收入比较少,处于收入的下层。此时,在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资本、技术密集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化,一方面拉动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也会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即“分配差距效应”,使得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个体获得的收入就多,处于收入的上层 (樊纲、张晓晶,2008)。

像拉美国家这样的发达国家曾经的殖民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收入差距问题会更加严重。作为落后的国家,各种“后发劣势”导致经济增长更加困难,创造就业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在发达国家成功经验面前,发达国家的财富和制度往往被看作“发达”的榜样,这会对拉美国家的发展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当权阶层中的一些人会产生“现在就要过上发达国家富人生活”的愿望,在监督机制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广大中下阶层,则很容易想往尽早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更希望现在就能享受发达国家劳动者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一个社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如过早过快地构建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可能使发展陷于停滞,最终实现不了这些目标,或者推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拉美国家的“停滞”的十年 (然后是“又一个十年”),也证明了这一点 (樊纲、张晓晶,2008)。

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多数国家不顾自己收入水平和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樊纲、张晓晶 (2008) 认为,“福利赶超”导致财政危机、经济波动及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实现再分配的目的,盲目进行财政扩张改善民生福利,置财政赤字增长于不顾,从而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与宏观经济风险增大;二是采取大幅提高实际工资但限制物价上涨的方法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置市场机制于不顾。即便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它们也拒绝货币贬值 (因为它们坚定地认为货币贬值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与其初衷相悖)。这种无视财政约束及市场机制的做法,最终引发高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由以上分析可知,拉美国家的“增长陷阱”主要是由于在“经济赶超”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了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国家进行了“福利赶超”,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由此引发了财政危机,导致经济波动,最终造成增长的停滞。实际上,当政府财政支出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时,出现的财政危机不仅仅通过宏观经济波动,同时也可能通过经济增长途径导致“增长陷阱”。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为此政府扩大了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福利赶超使得政府的支出超过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技术创新由此减弱,经济增长陷入了“中等收入增长陷阱”。

三、数理模型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机制的微观基础是由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所构成的,即政府行为会影响企业决策。但如何模型化这一思想却没有标准的方法,有的在技术进步函数中加进政府因素,有的则在人力资本项中加进政府因素,但一般不认为政府会全方位影响企业生产函数(这样就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不符)。但对赶超的经济体而言,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却是全面的。本文采用如下的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

$$Y = A F(K, L) \quad (1)$$

其中, Y 是产出, A 是技术进步, K 是资本, L 是劳动。

(一) 政府行为

经济赶超的国家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体现在为市场中的所有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对企业提供知识财产支持等。为了分析政府的这种支持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我们用 μ 表示政府对企业支持的程度, 且有 $\mu \in [0, 1]$ 。 $\mu = 1$ 表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支持; $\mu = 0$ 表示政府对企业完全不支持, 由此可知, 政府对企业支持的程度随着 μ 的值增大而增大。

(二) 生产函数

政府支持系数 μ 对企业产生两种效应: 一是对投入要素产生影响; 二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我们构建如下的微观企业生产函数:

$$Y = A(\mu) F[K(\mu), L] \quad (2)$$

为了分析上的简便, 去掉生产函数 (2) 中劳动力要素, 这并不影响本文分析的结论。 这样企业生产函数可简化为:

$$Y = A(\mu) F[K(\mu)] \quad (3)$$

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较多, 本文着重分析政府对企业支持程度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A 。 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 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和不包括在资本投入中的。 这样, 企业技术进步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间呈现出正向变化, 由 μ 的定义可知, A 与 μ 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这样我们可构建如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函数:

$$A(\mu) = (1 + \mu)^{1-\phi} \quad (4)$$

为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其值受政府财政收入及对企业财政支持的影响, 且 $0 < \mu < 1$, $0 < \phi < 1$ 。

由 (3)、(4) 两式, 我们可得到如下的具体生产函数:

$$Y = (1 + \mu)^{1-\phi} [(\phi + \mu)^{(\phi-1)/\phi} K] \quad (5)$$

其中, $0 < \mu < 1$, $0 < \phi < 1$, $0 < \mu < 1$, $\phi > 1$; ϕ 为政府支持环境下企业的投入效果, 因为企业获得了政府支持, 所以 ϕ 值会大于 1, 而且其值会随政府支持程度提高而增大, 如政府取消支持则 $\phi = 1$ 。

企业所获取的利润为:

在这里, 我们所说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包含很广的含义。 不仅包括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 也包括政府对企业形成有利的竞争力支持, 还包括政府对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创新支持等。

该生产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1) 每种投入都具有正的、递减的边际产品, 即 $F_K(\cdot) > 0$, $F_L(\cdot) > 0$, $F_{KK}(\cdot) < 0$ 和 $F_{LL}(\cdot) < 0$; (2) $F(\cdot)$ 呈现出不变规模报酬; (3) 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即: $\lim_{K \rightarrow 0} F_K(\cdot) = \lim_{L \rightarrow 0} F_L(\cdot) = \infty$, $\lim_{K \rightarrow \infty} F_K(\cdot) = \lim_{L \rightarrow \infty} F_L(\cdot) = 0$ 。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充裕,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也较高, 劳动力流动性也较大, 政府支持 μ 对劳动力 L 发挥作用的效力影响并不大。 这样, 在式 (3) 中, 我们设定 L 发挥作用与 μ 没有关系。

林毅夫和任若恩 (2007) 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 发达国家处于国际技术的最前沿, 企业取得技术进步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 与此相反, 发展中国家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采取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技术进步, 通常包含在新的机器设备中。

该函数的设定来自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5)一文中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K(\mu) = (\phi + \mu) K$), $K(\mu) = (\phi + \mu)^{(\phi-1)/\phi} K$ 。 卢卡斯的技术进步是来自生产的外部性, 而该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则来自政府支持下的企业技术进步。

$$= [(1 + \mu)]^{1-\mu} [(\phi + \mu)^{(1-\mu)/\mu} K] - m \cdot K \quad (6)$$

式 (6)是以实际产出计价 (即假设产出价格 $p = 1$), m 为投入要素 K 的相对价格。企业行为方式由式 (7)所决定:

$$\max_K [(1 + \mu)]^{1-\mu} [(\phi + \mu)^{(1-\mu)/\mu} K] - m \cdot K \quad (7)$$

由式 (7)可得:

$$K = (1 + \mu) (\phi + \mu) B, \quad B = (1 + \mu) (\phi + \mu) (B - mB) = 0 \quad (8)$$

其中, $B = (\phi/m)^{1/(1-\mu)}$, 为企业所获取的利润。

(三)福利型经济增长机制

政府的目标就是满足居民不断增大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为了达到该目标,政府的具体目标就是改善居民福利,这样政府财政支出呈现刚性。为了体现政府公共支出的刚性,我们采用如下政府支出函数:

$$E(\mu) = (\mu t - \mu) \quad (9)$$

其中, $E(\mu)$ 为政府公共支出, μ 为公共支出的刚性度, $0 < \mu < 1$ 。式 (9)中的 t 不仅有一般时间上的意义,在这里还意味着财政支出不断的增大。式 (9)的经济学含义为: (1)政府公共支出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增长呈现出刚性; (2) μ 值的增大,即政府对企业支持程度的上升,政府公共支出 $E(\mu)$ 就有可能减少。

政府会顾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其发展的目标函数为:

$$F(A(\mu), E(\mu)) = \ln A(\mu) + E(\mu) \quad (10)$$

其中, $A(\mu)$ 和 $E(\mu)$ 分别为企业技术创新函数和政府支出函数。式 (10)的经济学含义为: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长期目标,而经济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技术创新;政府同时追求居民的福利提高,它可体现在不断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上。

当政府的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即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足时,政府就不会掠夺企业资源来维持公共支出增长,政府对企业的支持 μ 由式 (11)所决定:

$$\max_{\mu} F(A(\mu), E(\mu)) = \ln(1 + \mu)^{1-\mu} + (\mu t - \mu) \quad (11)$$

利用 Kuhn - Tucker定理来求解式 (11),可得到:

当 $t < t_1$, $\mu = 0$; 当 $t_1 < t < t_2$, $\mu = \frac{(1 - t) - (1 - t_1)}{(1 - t)}$, 且 μ 的值随着 t 的增大而不断增大, μ 的值随着 t 的增大也不断增大; 当 $t > t_2$, $\mu = 1$ 。其中, $t_1 = \frac{1}{1 - \mu} - \frac{(1 - \mu)}{(1 + \mu)}$, $t_2 = \frac{1}{1 - \mu} - \frac{(1 - \mu)}{(1 + \mu)}$, t_1 和 t_2 随着 μ 的增大而减小。这样,财政支持与政府支持企业程度间的关系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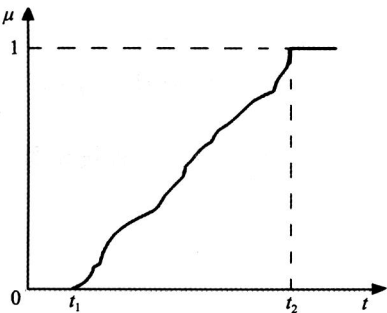


图 2 政府支出不受经济发展限制时 μ 与 t 间所呈现出的关系

由图 2可知,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行为 μ 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取值是不一样的。政府公共支出不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时,政府逐渐增加对企业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会不断增强。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μ 也影响着政府支持保护行为和企业技术创新。当 μ 值增大时,点 t_1 和 t_2 向左

在我们所分析的企业中,无论什么企业,只要正常生产,则获取的利润须大于或等于 0。
该发展目标函数的设定是为了计算的简便,这不影响分析结论。

移动, t_1 和 t_2 间的曲线向上移动, 技术创新会不断增强; 反之, 当 τ 值减小时, 点 t_1 和 t_2 向右移动, t_1 和 t_2 间的曲线向下移动, 技术创新就会减弱。

(四)福利赶超型经济增长机制

当政府公共支出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 政府收入落后于政府支出的增长, 政府债务又受到约束, 此时政府会掠夺企业资源来维持公共支出增长。政府行为由下式 (12) 所决定:

$$\begin{aligned} \max_{\mu} & \ln(1 + \mu)^{1-\tau} + E(\mu) \\ s.t. & 0 \leq \mu \leq 1; \mu t - \mu = (1 + \mu)(\phi + \mu)(B - mB) \end{aligned} \tag{12}$$

其中, τ 为税率。利用 Kuhn - Tucker 定理求解式 (12), 可得到:

当 $t < t_1$ 时, $\mu = 0$; 当 $t_1 < t < t_2$, $\mu = \frac{(1 - \tau) - (1 - \tau)t}{(1 - \tau)}$, 且满足: $v(1 + \mu)(\phi + \mu) > \mu t - \mu$, μ 的值随着 t 的增大也不断增大; 当 $t_2 < t < t_3$ 时, $\mu = 1$; 当 $t > t_3$ 时, $\mu(t)$ 的值满足方程: $v(1 + \mu)(\phi + \mu) = \mu t - \mu$, 该方程存在一个根 $\mu(t)$ 满足 $0 < \mu < 1$, 并可证明: $\mu = \mu(t) < 0$, 即 μ 随着 t 的值增大而减小。其中, $v = (B - mB)$, t_1 和 t_2 如前文, $t_3 = \frac{1}{1 + \tau} + \frac{v(1 + \tau)(\phi + 1)}{v}$, t_1 和 t_2 随着 τ 的增大而减小, 而 t_3 随着 τ 的增大而增大。

政府对企业支持程度 μ 呈现如图 3 所示的变化, 当政府公共支出受到政府收入限制时, 即政府公共支出扩大超过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能力, 政府支持系数 μ 将会减少。由图 3 所示, 当 $t > t_3$ 时, 随着时间 t 增长, μ 的值将会减少, 此时技术创新 $A(\mu)$ 也将减小, 经济不可持续增长。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τ 会改变上述增长的路径。当 τ 值增大时, 即政府增加对企业经济支持的力度, 点 t_1 和 t_2 向左移动, t_1 和 t_2 间的曲线向上移动, 点 t_3 向右移动, 技术创新就会增强。当政府的公共支出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限制时, 如 τ 的值能满足 t_3 的值足够的大, 经济也能高速增长, 但不可持续; 反之, 当 τ 值减小时, 即政府减少对企业经济支持的力度, 甚至增加企业负担, 此时点 t_1 和 t_2 向右移动, t_1 和 t_2 间的曲线向下移动, 点 t_3 向左移动, 技术创新就会减小更多, 经济增长会更加缓慢。这就是由于其他经济因素占用了本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 使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激励, 经济便会出现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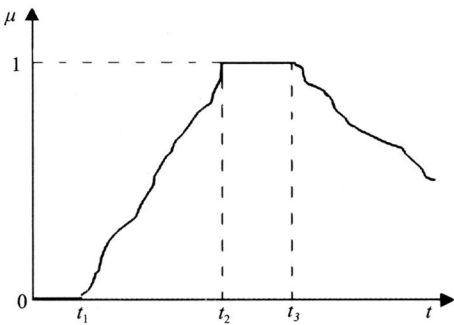


图 3 政府支出受到经济发展限制时 μ 与 t 间所呈现出的关系

四、“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由式 (5) 和式 (8) 可得如下的生产函数:

$$Y = (1 + \mu)(\phi + \mu) \left(\frac{1}{m} \right)^{\tau(1-\tau)} \tag{13}$$

其中, $0 < \tau < 1$, $0 < \phi < 1$, $0 \leq \mu \leq 1$, $\phi \geq 1$, $m > 0$ 。

由上文的分析, 就政府对企业支持意愿指数 τ 不同取值, 我们分两种情况分析经济增长的路径。

(一)正常的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

当政府的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 有 $t < t_1$, $\mu = 0$; 当 $t_1 < t < t_2$, $\mu = \frac{(1 - \tau) - (1 - \tau)t}{(1 - \tau)}$; 当 $t > t_2$, $\mu = 1$ 。其中, $t_1 = \frac{1}{1 + \tau} - \frac{(1 - \tau)}{v}$, $t_2 = \frac{1}{1 + \tau} - \frac{(1 - \tau)}{(1 + \tau)}$, 我们可得到如下的产出函数:

1. 当 $t < t_1$ 时, $Y = \phi \left(\frac{1}{m} \right)^{\tau(1-\tau)}$;

$$2 \text{ 当 } t_1 < t < t_2 \text{ 时, } Y = \frac{(1 - \delta) f(1 - \delta) + (\phi - 1)(1 - t)}{(1 - t)^2} \cdot (\delta/m)^{1/(1-\delta)};$$

$$3 \text{ 当 } t > t_2 \text{ 时, } Y = (1 + \delta)(\phi + 1)(\delta/m)^{1/(1-\delta)}.$$

为了分析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设定 $\delta = 0.05$, $\phi = 0.40$, $\phi = 1.2$, 分别取 0.60 、 0.40 和 0.20 , 利用 Matlab 进行数值模拟。由图 4 可知,随着时间的发展产出量会不断增大;当产值达到一定值,产出就维持在该水平上。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意愿指数 δ 影响产出量,随着 δ 值的减少,产出线不断下降,且 t_1 和 t_2 也不断增加,两者的间隔减少。由此可见,政府对企业支持意愿指数 δ 的大小影响产出的大小,而 δ 的大小受到政府财政收入影响。由此可知,当政府的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但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δ 影响持续产出大小及增长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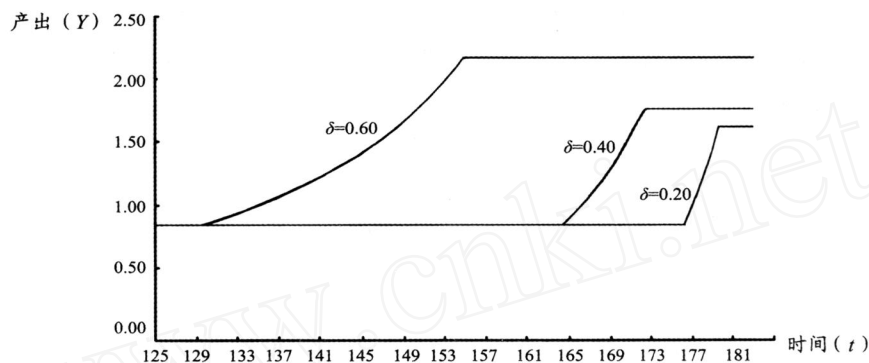


图 4 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经济可持续增长及其 δ 的影响

(二)“福利赶超”与“收入增长陷阱”

当政府公共支出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有 $t < t_1$ 时, $\mu = 0$; 当 $t_1 < t < t_2$, $\mu = \frac{(1 - \delta) - (1 - t)}{(1 - t)}$, 且满足: $v(1 + \mu)(\phi + \mu) > \mu t - \mu$; 当 $t_2 < t < t_3$ 时, $\mu = 1$; 当 $t > t_3$ 时, $\mu(t)$ 的值满足方程: $v(1 + \mu)(\phi + \mu) = \mu t - \mu$, 该方程存在一个根 $\mu(t)$ 满足 $0 < \mu < 1$, 并可证明: $\mu = \mu(t) < 0$, 即 μ 随着 t 的值增大而减小。其中, $v = (B - mB)$, t_1 和 t_2 如前文, $t_3 = \frac{1}{\delta} + \frac{v(1 + \delta)(\phi + 1)}{\delta}$ 。我们可得到如下的产出函数:

$$1 \text{ 当 } t < t_1 \text{ 时, } Y = \phi(\delta/m)^{1/(1-\delta)};$$

$$2 \text{ 当 } t_1 < t < t_2 \text{ 时, } Y = \frac{(1 - \delta) f(1 - \delta) + (\phi - 1)(1 - t)}{(1 - t)^2} \cdot (\delta/m)^{1/(1-\delta)};$$

$$3 \text{ 当 } t_2 < t < t_3 \text{ 时, } Y = (1 + \delta)(\phi + 1)(\delta/m)^{1/(1-\delta)};$$

$$4 \text{ 当 } t > t_3 \text{ 时, } \mu(t) \text{ 的值满足方程:}$$

$$v(1 + \mu)(\phi + \mu) = \mu t - \mu \quad (14)$$

$$Y = (1 + \mu)(\phi + \mu)(\delta/m)^{1/(1-\delta)} \quad (15)$$

由式 (14) 和式 (15) 所能决定产出 Y 的值。

为了分析政府“福利赶超”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样设定 $\delta = 0.05$, $\phi = 0.40$, $\phi = 1.2$, 税率 τ 设定为 0.1660 , 分别取 0.60 、 0.40 和 0.20 , 利用 Matlab 进行数值模拟。由图 5 可见,随着时间的发展,产出量不断增大;当产值达到一定值时,产出量达到最大值并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政府“福利赶超”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对企业支持将会下降,技术创新下降从而产出将下降。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δ 的值影响着产出量,随着 δ 值的减少,产出线不断下降,且 t_1 和 t_2 也不断增加,两者间隔减少。由此可见,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δ 的大小影响着产出的大小,而 δ 的大小受到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因此,当产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经济发展受到福利支出刚性的影响,经济不可持续增长,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 δ 影响持续产出大小及增长路径。这一点可由拉美国家福利赶超使得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该值来自 2000 - 2007 年间的中国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的平均值。

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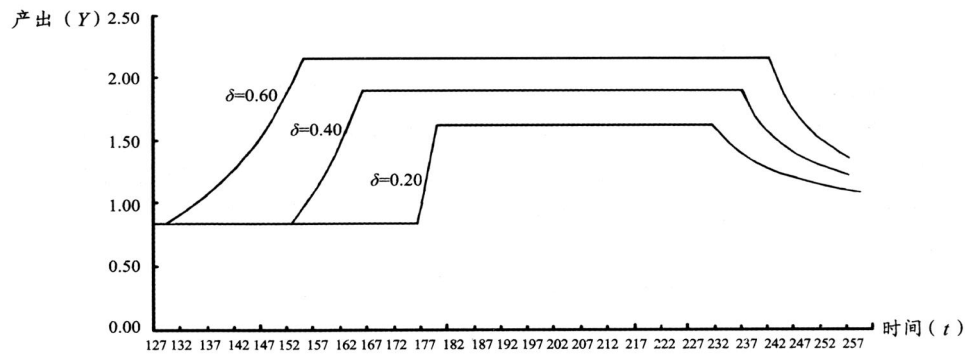


图 5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经济不可持续增长及其 的影响

1954 - 1980年间,拉美国家经济不断增长,人均 GDP不断增大。但 198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大逆转,20世纪 80年代持续衰退,20世纪 90年代继续低迷(见图 1)。1980 - 1990年拉美国家(根据 23 国的统计)GDP年均增长率很小,其中阿根廷、萨尔瓦多、海地、尼加拉瓜、秘鲁、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国是负增长;拉美地区人均 GDP年均增长率为 - 0. 9%,其中只有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巴多斯和牙买加 5个中、小国家是正增长。1991 - 2000年,拉美地区(根据 31 国的统计)GDP年均增长率为 3. 3%,其中海地是负增长;拉美地区人均 GDP年均增长率为 1. 5%,其中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委内瑞拉和牙买加 5国为负增长。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社会公共支出增长较快,表 1反映了 1980 - 2001年拉美国家社会支出的变化趋势。1980年,拉美国家社会支出占 GDP的比重还较低,平均在 5%左右,只有 3个国家超过了 10%。但到 1990年代,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支出从占 GDP的 10%不断上升,一直到 2000年左右达到 13. 8%。而以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整个拉美国家平均由 1990 - 1991年的 41. 8%上升到 1998 - 1999年的 47. 8%。而有些国家到 90年代末,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达到 60% ~ 70%,甚至 70%以上(如巴西 60. 4%,阿根廷 63. 6%,智利 66. 8%,乌拉圭 72. 5%) (樊纲、张晓晶, 2008)。

表 1 1980 - 2001年拉美国家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 (%)

	1980	1990 - 1991	1992 - 1993	1994 - 1995	1996 - 1997	1998 - 1999	2000 - 2001
阿根廷	10	19. 3	20. 1	21. 1	20. 0	20. 8	21. 6
玻利维亚	3	Na	Na	12. 4	14. 6	16. 3	17. 9
巴西	5	18. 1	17. 7	19. 3	17. 3	19. 3	18. 8
智利	11	11. 7	12. 4	12. 3	13. 0	14. 7	16. 0
哥伦比亚	4	6. 8	8. 1	11. 5	15. 3	14. 0	13. 6
哥斯达黎加	9	15. 6	15. 2	15. 8	16. 8	16. 4	18.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2	4. 3	5. 9	6. 1	6. 0	6. 6	7. 6
厄瓜多尔	3	5. 5	5. 8	7. 4	8. 2	8. 1	8. 8
萨尔瓦多	2	Na	3. 1	3. 4	3. 8	4. 1	4. 2
危地马拉	Na	3. 4	4. 1	4. 1	4. 3	6. 0	6. 2
洪都拉斯	3	7. 9	8. 1	7. 8	7. 2	7. 5	10. 0
墨西哥	3	6. 5	8. 1	8. 8	8. 5	9. 2	9. 8
尼加拉瓜	2	11. 1	10. 9	12. 2	11. 3	13. 0	13. 2
巴拿马	7	18. 6	19. 5	19. 8	20. 9	21. 6	25. 5
巴拉圭	2	18. 6	19. 5	19. 8	20. 9	21. 6	25. 5
秘鲁	3	4. 0	5. 3	6. 7	7. 1	7. 7	8. 0
乌拉圭	11	16. 9	18. 9	20. 3	21. 3	22. 8	23. 5
委内瑞拉	3	8. 5	8. 9	7. 6	8. 3	8. 4	11. 3
拉美	4. 9	10. 1	10. 9	11. 7	12. 1	12. 8	13. 8

资料来源: 1980年数据来自《国际经济与社会统计资料》(1950 - 1982)以及 Mesa - Lago (1991); 1990 - 2001数据来自 ECLAC,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Na为缺少数据。

五、结论及建议

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我们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拉美国家“福利赶超”导致“增长陷阱”,

由数值模拟可得: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07 年城市化率达到 44.94%),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1978 年中国城市化率为 17.9%,政府集中所能用的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 64%;2006 年城市化率提高到了 44.90%,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则降低到了 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 2007 年超过了 30%,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20%多,由此可见,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公共财政支出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水平,可能会重蹈拉美国家“增长陷阱”之覆辙。针对目前中国公共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 重视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拉美国家的“收入增长陷阱”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政府增大公共福利性支出。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07 年中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已达 0.4428。在过去重视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的基础上,政府应特别强调初次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转变中国增长方式,创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

2 尽力压缩行政性开支。在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和公共支出不应超出经济发展所能接受程度的情况下,政府应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政府压缩行政性开支的核心在于压缩各级政府自身的利益,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公共社会福利和经济建设上。

3 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好公共财政支出,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财政的效力。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共财政一时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只能将有限的公共财政支出进行科学合理的使用,用在非常需要的地方,而不是全民性的福利支出,真正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造福于人民。同时,应努力减小公共支出的刚性,避免出现拉美国家由于“超福利支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 阿兰·丁·奥尔巴克等主编:《公共经济学手册》,第 1 卷,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收入陷阱”》,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
3. 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
4. 陈昌兵:《中国城市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的理论分析及实证》,载《当代经济科学》,2009(3)。
5. 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见林毅夫等编:《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6.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OLIS 数据库。
7.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 刘小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载《经济研究》,2003(1)。
9. 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见《经济发展讲座》,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 马岩:《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工作论文,2009。
11.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2. 苏振兴:《未竟的工业化——对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考察》,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张平、陈昌兵、刘霞辉执笔:《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载《经济研究》,2008(10)。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张晓晶、常欣、汪红驹执笔:《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6(10)。
15.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pp. 1369 - 1401.
16. Alesina, Alberto and La Ferrara, Eliana, 2004.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313
17. Bellagio, 2002. “Dynamics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ncepts and Data Limitation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USSP Expert Meeting
18. Rodríguez, Francisco, 200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s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Research Project,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LACEA).

(责任编辑:陈永清)

根据作者本人计算所得,其计算方法参见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